

Series of Works by the Doctoral Advisers of Hebei University

河北大学博导书系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HANWEI LIUCHAO WENXUE LUNJI

詹福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詹福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文京

封面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詹福瑞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8

(河北大学博导书系)

ISBN 7-81028-736-2

I. 汉… II. 詹…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 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902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13

字数:248 千字

印数:1~2000 册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8 月第 1 次

ISBN7-81028-736-2/I·140

定价:23.00 元

出版说明

值此河北大学八十周年华诞之际,《河北大学博导书系》与读者见面了。

八十年的风雨历程,使河北大学逐步成熟,渐入佳境。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更使河北大学如浴春风,飞速发展。成就世人瞩目,展示方式丰富多彩。作为学校有机组成部分的河北大学出版社,为了向校庆献一份厚礼,更为了学校的超常发展,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能力,决定编辑出版《河北大学博导书系》。

大学之“大”,不在其楼高院阔,而在它的文化创造能力、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在河北大学范围内,博士生导师是肩负文化创造、传播和发挥影响力重任的主要力量。《河北大学博导书系》选取科研论文结集出版的形式,旨在总结以往的科研成就,展示目前达到的科研水平,以期向世人汇报河北大学的文化创造能力、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

《河北大学博导书系》涉及内容广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河北大学的综合性质;其中的每一本、每一篇论文,都是作者劳智费神的创造性结晶。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有切身的感悟和体会。

在《河北大学博导书系》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也承蒙博士生导师们极力配合和积极参与,对此表示诚挚谢意。

河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	(1)
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 ·····	(18)
“文”、“文章”与“丽”·····	(34)
汉儒说《诗》与“诗言志” ·····	(56)
“诗缘情”辨义 ·····	(87)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形成及其特点 ·····	(106)
从哲学之气到“文气” ·····	(122)
《宗经》与《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	(140)
《文心雕龙》“典雅”考释 ·····	(158)
“通变”解义 ·····	(176)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189)
《文心雕龙》“总术”考释 ·····	(202)
永明诗风与《文心雕龙》“隐秀”论 ·····	(216)
东汉士风与个体意识的初萌 ·····	(230)
汉大赋的内在矛盾与文士的尴尬 ·····	(273)

建安时期士人的政治地位、社会

- 意识与文学思潮 (291)
- 论晋宋之际山水诗潮兴起的内因外缘 (304)
- 元嘉山水诗的创作倾向 (317)
- 永明士人心态与诗的平浅 (351)
- 试论谢朓清丽山水 (367)
- 宫体诗派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382)
- 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393)

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的最佳思维 (403)
- 延展视野,深化研究
- 谈《文心雕龙》研究的“打通”问题 (408)

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

此处所说的文士，特指文章之士。他们既不同于经生，也不同于文吏，而是一批致力于文章的创作，以辞章名世或立世的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

—

两汉时期，在皇帝和诸侯王周围，有了文学侍从之臣。这是一批以文章名世，且以文章立足于朝廷的人。

汉初，高祖及文、景二帝皆不喜文人，然而在诸侯王中却颇兴养士之风，吴王、梁孝王和淮南王周围，都聚集了一批文章之士。《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又载：“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所谓“文辩”，即能为辩丽之词，这是邹阳、枚乘等文士的看家本

领。邹阳与枚乘游于吴时,见吴王刘濞有反叛之志,二人都写了《上吴王书》劝谏吴王。邹文引秦为谕,因道汉初诸侯王灭国之鉴,气势与文采俱胜。枚文连譬博喻,宛转设辞,句多排偶,且时用韵语,颇富文采。当然,邹阳、枚乘等文士最擅长的还是辞赋。《汉书·艺文志》载庄忌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费振刚等辑《全汉赋》有邹阳赋二篇。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它虚构故事展开文章的模式,铺张扬厉的叙述与描写,以及相应延宕的篇幅,都开了一代赋风。《七发》向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它的文体的意义,还有文学侍从之作的创作特点。这种作品的特点即在于它的侍从性,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多带为主人而设的意义,无论劝谏、颂美或赏玩游宴之乐,都离不开这一特点。《七发》的写作目的,向有几种不同说法,或以为戒膏粱子弟,或以为谏吴王,或以为谏梁孝王。然而无论为谁而作,都有一个诸侯王的主人在,作品中,主人与侍从者的意识随处可见。《汉书·艺文志》虽载庄忌、枚乘赋几十篇,惜所传不多。今所见者,枚乘赋五篇,庄忌一篇,邹阳二篇。从现有的篇章看,除《哀时命》慨叹屈原受性忠贞却不遭明君外,其余作品都带有侍从文学的色彩。所谓“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聵,与此陈词,于嗟乐兮。”^①所谓“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②多为侍宴赏玩时应命之作。文士作品的这种侍从特点到汉武帝时就更显突出了。

汉武帝时，国势空前强盛。武帝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颇尚文事。在意识形态上，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划一政策，但对于文章之士却颇优待。《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了武帝安车蒲轮以征枚乘而得其孳子皋的故事：“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孳子皋。”武帝慕枚乘之名，慕的就是辞赋之名，而所征的枚皋，也是一个不通经术、擅长辞赋的文士。正因为武帝如此喜爱文章之士，因此一时间“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汉书·公孙弘传赞》）班固《两都赋序》对此言之甚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言语侍从之臣因名被征，所事之职为参与谋议朝廷之事，“因言国家便宜”^③，以及待诏赋颂之属。但除严助、吾丘寿王等少数人外，多数人不过是应诏拟文章赋而已。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景帝时任武骑常侍。景帝不喜辞赋，乃客游梁，作《子虚赋》，与邹阳、枚乘、庄忌等文士居。武帝好辞赋，读《子虚》，甚欣赏，乃召相如，作《上林赋》。赋奏，天子以为郎。史书记相如政事只有二件，即两次奉命出使西南。其他可堪称者唯有辞

赋之事。故《汉书》说他“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汉书》记其事迹，也主要是围绕他的写作之事而展开的。另一位辞赋家枚皋的事迹就更单纯：“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④不外待诏写辞赋而已。《汉书·艺文志》载枚皋赋一百二十篇，而据枚皋传，这一百二十篇不过是“可读者”，“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可见创作之丰。其他如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倪宽二篇，孔臧二十篇，司马迁八篇，文士之赋真可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武帝之后，宣帝刘询亦好辞赋，召集了一批文士待诏金马门。汉宣帝设文学侍从之臣，是沿袭了武帝故事，仍与国事无涉，仅以其娱悦耳目而已。因此，文学侍从的待遇不高，视同俳优博弈之徒。而王褒等文士，或以赋见招，或因赋得幸，侍从皇帝，随时献纳辞赋，带有了奉命为文的职业文人的性质。汉成帝时的扬雄，汉章帝时的班固和傅毅，皆似此类职业文士。

二

两汉时期，不仅有了一批以文章为侍从皇帝或诸侯王资本的专职文士，在一些非文学弄臣中，也出现了文士化的迹象。尤其是那些以明经为本的儒生，恪守一

经、白发死于章句的人固然大有人在，但走出经学樊篱，时常弄些文章这种雕虫小技的儒生也不乏其人。

汉武帝和汉宣帝时，写赋以献纳者不仅仅是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和王褒这些文章之士，“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据《汉书·倪宽传》，倪宽“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儒生为廷尉文学卒史。后见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是一个典型的以治经为业，又以明经起家的儒生。然倪宽亦“善属文”，《汉书·艺文志》载其赋二篇。又据《汉书·萧望之传》，曾为宣帝所重，官至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的萧望之，亦为儒生，以经明持重而名闻天子的。“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萧望之的经学渊源甚深，他所受业的后仓、夏侯胜都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但萧望之也写赋，《汉书·艺文志》载其赋四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列有孔臧作品，可见太常孔臧亦为儒生，而其有赋二十篇。甚至连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一生所著虽“皆明经术之意”，但当其两相诸侯国时也写了《士不遇赋》，抒写他的感慨。可见儒生之为文章，也是一代风气使然。

其后，既事儒学，又为文章之士人就更加多了。如刘向之子刘歆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最初研治

《易经》，后治《春秋左氏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⑤。他想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并移书太常博士，谴责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妬道真”（《汉书·楚元王传》），以至引发今古文之争。刘歆同其父一样，也是个既明经又能属文的人。《古文苑》卷五载其《遂初赋》，《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录其《甘泉宫赋》，卷八十录其《灯赋》。东汉时期的两位著名经学大师贾逵和马融也是能为文者。贾逵弱冠即能诵《左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文经学，兼通五家《谷梁》。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后世称为通儒。然其所撰不唯经学，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等作品多篇。马融是汉安帝、汉桓帝时通儒，学生常至千数。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和《尚书》。马融又是“俊才”之士，安帝元初二年，曾上《广成颂》，触怒外戚邓骘。后来安帝东巡岱宗，马融又上《东巡颂》，受到安帝称赏，召拜郎中。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等二十一篇。在马融的身上，文士化的色彩最为鲜明。

三

专事文章的士人在汉代的兴起以及经生的文士化倾向，促使作家的自觉意识迅速形成。作家观念的自

觉,首先表现为文士的刻意为文。

作家文学,溯其源头,当始于屈原。然而如细加研究便可发现,屈原无意做一个诗人。他的创作并非刻意为文,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带有原始的诗性精神,诗是他的情感的自然的本能发泄的需要所然。“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⑥。宋玉、唐勒等辞人学屈原而写辞,“皆好辞”而已。为好辞而写辞,是典型的刻意为文,为艺术而艺术。故扬雄《法言·吾子》把他们的作品与屈原作品分开来,称之为“丽而淫”的辞人之赋。这些人的写作观念当对汉代士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辞赋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学体裁。西汉及东汉前期辞赋多为体物大赋。作为士人的一代文学样式,这些作品都经过辞赋家精心构思与创作,这一点可从司马相如谈写赋的心得体会中看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⑦。此外,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的故事,也足以说明汉代辞赋家构思的认真和艰苦。

汉代的辞赋写作还有一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现象:竞相摹仿。尤其是体物大赋,千赋一面,摹仿之迹更加明显。造成摹仿现象的原因可找出多条,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文士对知名辞赋家的仰慕,故把这些辞赋家的作品作为学习的榜样。据《汉书·扬雄传》,扬

雄早年十分崇拜司马相如，写赋也要立以为则：“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桓谭《新论·祛蔽》也说扬雄年少时初露头角，想要赶上辞赋大家，用尽心力，以致成疾。

无论是精心构思，还是刻意摹仿，都说明汉代文士已不似《诗经》和汉乐府那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是刻意造文，有了自觉地追求辞赋家的理想和愿望。因此，可以这样说，汉赋之兴引起文学观念的最大变化就是作家观念的自觉。

作家观念的自觉还表现在史书中。辞赋家因为文章名世，开始成为史书中独立的传主。在《史记》中，司马迁开始单独为战国末年和汉初的两位著名辞赋家立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这两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并把重要篇幅放在介绍他们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心理基础上。传记中，还开了在本传中登载作家作品的先例。东汉班固沿承了《史记》单独为辞赋家立传的传统，在《汉书》中为司马相如、枚乘、严忌、邹阳、司马迁和扬雄等文章之士立传。对此现象，姚思廉《梁书·文学传》分析道：“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姚思廉的分析甚为准确，汉代人为文章之士立传，不是因为他们功业显赫，仅取其文章尤著而已。由此可见，文章之士已在当时社会中具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汉代人不仅为文章之士立传，而且明确提出了“文

章之徒”这个概念以示与其他士人的区别。班固《汉书》把文章之士与儒生作了明确划分,《公孙弘传赞》云:“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很明显,在班固看来,文章之士与儒生是两种类型完全不同的人。东汉王充则把文章之士称为“文儒”,把说经者称为“世儒”。“文儒”,就是《论衡·书解篇》所说的“书文奇伟”的“文章之徒”,即陆贾、司马迁、刘向、扬雄之属。从《书解篇》的问答看,当时有文儒不如世儒,徒为华淫之辞,无补于世的观念。王充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文士超过了经生。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把文士与经生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士人,当是这一时期人们的共识。

四

文士的独立与作家观念的自觉,直接影响到文学观念的觉醒。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说:“两汉文章渐富”,辞章之学兴。文章,在先秦泛指学术文化以及一切有文采的东西,但到汉代则主要指以辞赋为主的富有文采的文章。文章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的文学已经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析离出来,开始取得独立的地位。在西汉刘歆所著的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七略》中,《诗赋略》成为与《六艺略》、《诸子略》等图书门类并列的种类。

这是把文学作品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首次区分开来的一次尝试。班固《汉书·艺文志》沿用了这种划分法。这种划分显然是建立在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汉人如果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也就不可能把诗赋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区分开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图书门类。

文章之士的独立,也使汉代文学批评的重点转移到文章之士及其作品。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及其作品都开始成为汉代文士研究与批评的对象。譬如屈原,西汉时,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东汉时期,班固和贾逵分别著《离骚经章句》,马融著《离骚注》,王逸著《楚辞章句》。这些书不仅对屈原作品作了详细注释,而且对屈原也开展了全面批评。

汉人解说《诗经》,受师法家法的局限,仍普遍存在为推行教化而附会以政治和伦理道德内容的现象;然而对于新兴文体如楚辞和汉赋的批评,虽然并未完全摆脱经学阴影,却出现了关注辞赋家人格、个人命运和身世遭际的倾向。尤其是文士对《离骚》等屈原作品的批评,常常是紧紧围绕着作家人格和其个人命运、遭际的叙述和评价而展开的。

刘安评屈原,充分肯定了他“皜然泥而不滓”的高洁人格。司马迁对刘安的观点是赞同的,所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完全采纳了刘安的说法。同时,本传还以极为同情的态度,详细记载了这位伟大诗人的遭遇;